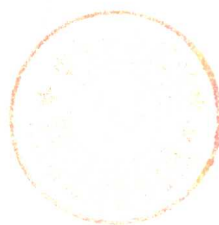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县智新乡明东村朝鲜族社会
历史調查报告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說 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八月底止，先后在吉林和辽宁两省朝鮮族聚居区进行調查。編写出調查报告（初稿）。以后由于該調查組的成員陸續分配了工作，离开調查組，这些調查报告便由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历史語言研究委员会协助整理出来，交給我們。为了保存資料，我們对这些調查报告仅做了文字上的初步修改，現在把它印出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从这些調查报告来看，我們感到，其中經濟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調查資料比較具体、全面；但相对的說，上层建筑方面的材料，如风俗习惯等，却显得比較单薄。有些反面材料，只做了現象的罗列，沒有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另外，有关人民公社部分反映的也比較少，因限于時間及材料关系，我們未做补充。其內容謬誤之处，亦在所难免，謹請同志們指正。

中国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学术秘書室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目 录

一、一般情况	(1)
(一) 地理环境	(1)
(二) 人口	(1)
二、历史	(3)
(一) 从开发到“九一八”时期的明东	(3)
1. 明东村的开发	(3)
2. 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	(5)
3. 明东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情况	(6)
(二) 日伪黑暗统治下明东人民的抗日活动 (1931—1945)	(7)
1. 日伪的黑暗统治	(7)
2. 人民的抗日斗争	(8)
(三) 解放以来几次政治运动情况	(9)
1. 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9)
2.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0)
3. 对建立朝鲜族自治州的反映和普选情况	(10)
4. 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12)
三、经济	(12)
(一) 生产关系的变革	(12)
1. 土地改革运动	(12)
2. 农业合作化运动	(17)
(二) 生产的不断发展	(26)
1. 农业	(26)
2. 副业	(33)
3. 手工业	(35)
4. 林业	(37)
(三)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38)
1. 解放前的痛苦生活	(38)
2. 解放后的美好生活	(39)
3. 一家人的生活变化情况	(39)
四、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	(40)
(一) 教育事业	(40)

(二) 文化科学和体育活动.....	(43)
(三) 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	(44)
五、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	(45)
(一) 生活习俗.....	(45)
(二) 宗教信仰.....	(48)

一、一般情况

(一) 地理环境

明东村属延吉县智新乡，位于延吉县东南部，离龙井镇只有四十华里。全村包括六个自然屯，即中英屯、明化屯、明东屯、东明屯、大龙屯、光明屯。全村居民点比较分散，屯与屯之间的距离近的相隔一、二里，远的相隔四、五里。现在的明东最初叫“龙岩洞”。明东村东岭从元良哈岭蜿蜒分出来，形似“龙”，明东村北面有一立崖，如同如意珠，东岭与立崖很像龙玩如意珠。当时人们认为龙是吉祥之兆，遂依地形起名为龙岩洞。一九〇八年龙岩洞成立了明东学校（该校早期是朝鲜族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心），因而人们开始叫“龙岩洞”为明东村。

明东村四周皆山，它位于山沟的东北角，南边是智新村、自由村，西北边与长财村接壤，东边隔山与英洞村分界。八十年前，这里的山上及山坡地带均被原始森林所复盖，平地是茅草丛生的沼泽。当时林木最大的直径约达三——四尺，一般约二尺左右。后来由于朝鲜族和汉族人民相继来此开荒，树木逐渐被砍伐，又由于频繁的山火烧毁，因此，五十年前这些山几乎成为秃山了。后来，山上自然的生长了一些阔叶树，特别是解放以后大力开展护林防火和造林工作，山林逐渐的恢复起来了。

明东村南有一条海兰河支流，河小湍急，解放前洪水经常泛滥，据说一九一二年出现一次最大的洪水，一天竟达九次洪峰，原来的一片沼泽被沙石掩盖，中英屯前的湖泊亦被沙石填塞。海兰河支流因为洪水屡次泛滥，上游冲下泥沙而使河床不断上升，达二公尺之多。最后一次洪水是在一九三八年，大礮子附近的山上冲下很多石头，致许多房屋倒塌，牛棚猪圈被卷走，支流两岸被沙石淹没的田地从立崖到大礮子约有一百多垧，不能再行耕作。

本村因地势高，气温较低，全年无霜期约一百四十——一百五十天左右。据老人回忆现在平均气温比从前稍高，从前下霜早，现在通常是在白露和秋分以后下霜（阳历八月二十日左右）。雨量也少，降雨量一般集中在六——七两个月。风向：冬天多刮西北风，阴历二——三月多刮西风；夏季多是东南风，阴历五月多刮南风，东风很少。

明东一带物产资源丰富。土地比较肥沃，有粘土与白灰土，厚约二公尺左右，山地是半沙半岩性沙土。粮食作物有谷子、玉米、高粱、大麦、水稻等；经济作物有大豆、黄菸、亚麻等。附近山林里有各种小野兽与药材，成为当地副业生产的对象。在元东、德寿一带发现有铁矿。相传大礮子对面的山下有石油。在长财、明东二村都蕴藏有油母页岩，胜地有石灰石，大龙洞有煤矿等丰富的矿藏。

(二) 人口

明东村有一百六十一户，八百二十八人，全部是朝鲜族。其中男三百九十四名，占

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女四百三十四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平均每户人口五点一人。开发以前明东一带清朝政府的统治势力未完全建立，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所以有许多受尽了封建压榨和遭自然灾害的朝鲜穷苦农民，尤其是仅一江之隔的朝鲜咸镜北道农民经常涉江而过，前来开垦。比较大规模迁入是在八十年前左右，特别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朝鲜农民成批地迁来。较近的朝鲜农民迁来时往往携家带眷，甚至有的连自己的牛、车、农具都带来。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关内的汉族人到明东。起初他们都是单身来，安置妥当以后再迁来家属。除了大地主董汉外，当时的汉人多数是从事伐木、采药、淘沙金等的贫穷农民，后来都流往城市或其他地区。因此现在明东村没有汉族。

初迁来的朝鲜族农民都住在山腰中间。因为他们都是惨遭封建地主和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与压迫而前来谋生的贫苦农民。来明东一带后，肥沃的土地已被地主所占有，要购买土地既没有钱，也没有土地所有权。那个时候平地与洼地多系沼泽地带，常有洪水泛滥。而且开荒头三——四年不交租，因此都到山沟与山腰中间开荒。后来地主出卖山下土地，才开始由山中间迁到平地，集居成村落。但历史上，这一带人口流动性较大。来到明东的一部分朝鲜族农民，为了找到可靠的生活出路，住了几年后又往北满的密山、牡丹江一带迁移，或者因为明东土地不多又回到朝鲜，过几年又返回。由于往返迁移，所以解放前明东人口的流动较大。甚至解放初期这一带由于土匪横行，盗贼猖狂，人民生命财产很不安宁，有一部分农民迁走。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口逐渐增加，流动也相对稳定。

解放前，人民生活贫困，卫生保健事业根本没有，年年流行传染病又无钱请医生、买药，尤其流行麻疹，婴儿死亡率很高。解放后，传染病逐渐减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增进了人们的体质，死亡率下降，人口逐年增加。从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人口出生和死亡情况来看，便是一个明显对比的事实。

一九五三年出生十三人，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六；

死亡十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二；

人口增加三人，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四。

一九五四年出生二十六人，出生率为百分之三点二；

死亡十二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四；

人口增加十四人，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八。

一九五五年出生十三人，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六；

死亡八人，死亡率为百分之零点九三；

人口增加五人，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七。

一九五六年出生十五人，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八；

死亡五人，死亡率为百分之零点六；

人口增加十人，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二。

根据一九五八年初统计，该村人口情况列表于下：

人口統計表

(1958年初統計)

總戶數		階級成分(戶)				職別(名)			文化程度(名)				
161		富	中	貧	參加生產 農業	教	學	老人、 兒童	大	高	初	高	初
總人口		農	農	農	業	員	生		學	中	中	小	小
男	女												
394	434	5	22	134	430	13	176	209	2	13	73	160	263
823													

二、歷史

(一) 从开发到“九一八”时期的明东

(一八六〇年——一九三一年)

1. 明东村的开发

現在的明东村，在一八六〇年开发前，平地都是沼泽，无法开垦。能开垦的只是一些山坡地。这块地于一八六八年左右为汉族地主董汉所占有。当时立岩以南，大褶子以北的荒地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在这里还开过油坊和烧锅。关于这一带荒地的开垦有如下说法：

①全永国老人說：“我于一八九八年到长財屯时，除了董家住房附近的几垧地外，其他荒地都是朝鮮族佃戶开垦的，并由佃戶租种，沒有雇过工。”

②李仲民老人說：“我們来时董汉除把土地租給朝鮮族佃戶种外，自己还种了一大片大烟，农忙时就雇一百多从朝鮮会宁过来的短工。这些地平时則雇汉族长工耕种。”

这些說法，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这片土地是朝鮮族与汉族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的。八、九十年以前，延边一带是属于清朝的封禁地区，不許人民开发，朝鮮的农民更不能过江前来，如果犯禁被发觉后要杀头。但因生活所迫，冒险过江来开发的朝鮮农民仍然不少。最初他們都不长住，春天解冻以后来种地，入冬收割后就回去。后来朝鮮族农民成批地迁来，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迁入的最多，并且长期居住下来。朝鮮族迁来延边的原因各个时期都不尽相同，綜合起来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經濟方面的原因：八十年以前朝鮮境內經常有自然灾害，农业普遍歉收，粮食奇缺，随着是严重的飢饉。每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襲，总是有很多人餓死，严重时竟有“易子而食”的現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謀求生路，朝鮮族开始較大規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大部分是流入延边，也有一部分人到苏联东南沿海一带。其次，朝鮮境内有的

地区土地少，人口多，耕地缺。更主要的是在封建地主剥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之下，许多农民破产，失去了土地。广大贫苦农民即是保留一点土地也多是山坡丘陵地带，土质贫瘠，收获低微，也不能维持家庭生活。这也是促使他们向外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广大贫苦农民忍受不了封建地主和反动政府的愈来愈重的地租、赋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忍受不了地方官吏的欺凌、勒索和土匪强盗的蹂躏。二十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以后，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强，农民生活更加悲惨。为了免于强暴的统治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逃生。当时他们流传延边一带没有统治者，土地又肥沃，物产富饶，人们可以自由开发，是谋生的最好归宿地。而且从朝鲜到延边只有一江之隔，跨江即达，所以大量的朝鲜族人民先后来到延边地区。

最初他们居住在兀良哈岭以南，图们江岸一带，以后逐渐迁移到布尔哈通河，海兰河流域。明东山下有一条湍急但水不大的河流，两岸土地肥沃，同时山不高，坡不大，适于农业生产，于是有一部分人来到明东。定居以前到此开垦的多数人是图们江对岸朝鲜的六邑（指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茂山六镇）一带的农民。长期居住下来开垦的主要是朝鲜咸北道，茂山岭以南的富宁、镜城、明川、吉州等地迁来的朝鲜族。

在朝鲜人民迁入的同时，关内也有许多汉族农民来到明东。最初来的朝、汉族农民都很贫穷，朝鲜族农民多数是扶老携幼，从事农业，而汉族人则不携家眷，多系“跑腿子”，从事伐木、采药、淘沙金以及当“货郎子”（小商贩）等。他们生活极为困难，没有能力盖房子，就在山坡上挖坑搭窝棚住，形成所谓“牛在房上走”的情况。没有饭碗，用吃过的南瓜皮代替，几家共用一把斧子。没有火柴，用火石取火，或者细心地把火种保管起来，否则就得去远处借火。当时明东一带也是地多人少，有的地根本无人耕种，地主董汉为了使这片荒地开垦出来，奴役这些穷苦的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剥削手段。新开荒的地三年不收租，而且还借给粮食、牛、农具和青布，三年后开始收租，地租由“二八”、“三七”、“四六”逐渐上升。清末都实行高额地租“对分制”，有的沃土竟收租三分之二多。

一八九九年董汉死后，其家属要返回老家，他的大部分土地经过安成柱、金炳浩、朴允涉三个“入籍”的朝鲜族富户转卖给朝鲜族农民。安成柱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曾经是董地主的帐房。金炳浩把他的妹妹、女儿都嫁给有权有势的汉人，他借这种势力欺压乡里。朴允涉是大福子一带的“势力家”。一般朝鲜族农民虽然开垦了很多荒地，但没有所有权，也无权购买汉族地主的土地，要购买土地只有合伙使用一张地照，由“入籍”的朝鲜族（一般都是有钱的上层分子）出名义，这个人就称为“名义地主”，他由这些购买的土地中得一名义费。当时朝鲜族农民买了董家的土地后，分住于七个村落：长财约三十多户，明东（当时叫下中英）约十余户，中英（称中中英）约七——八户，圣教（称上中英）约二十来户，小龙洞约十五户，大龙洞约二十多户，丰乐洞最多，约八十多户。安成柱、金炳浩、朴允涉也就成为明东一带的“名义地主”。

朝鲜族初迁来时，贫富阶级之间斗争尚不够激烈。随着清政府与军阀政府剥削的加重，广大贫苦农民愈加贫困。而一些原来比较富裕的人“入籍”以后，获得了土地所有

权。他们出名义购买土地，成为“名义地主”，并无偿的获得百分之十——二十的土地。对衙门则是全部土地的地主，纳税亦以其名义，逐渐成为地方上的统治势力家。清政府也委派他们为社长（社是清政府在延边统治的基层单位）。这是朝鲜族上层分子与统治阶级勾结的最初情况。后来他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地主。大地主南君弼在日寇侵入延边不久，就与东拓（前身是救济会）勾结，当时东拓没有土地权，通过南君弼卖地，南君弼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展起来。有的则靠诈骗、靠贩卖鸦片等发了财。“名义地主”金炳浩为了他出名义购买的农民土地，扬言自己儿子被“胡子”（即土匪）抢走了，要求乡人帮忙，说有地照才能赎回他儿子，弄到地照后说地照给“胡子”拿走了，儿子却没有赎回来等，以此骗取了一些农民的地照。农民识破了他的诡计，与他进行斗争，多次打官司，许多农民把土地都押光了，以致于倾家破产。姜仲植经常贩卖鸦片、牛、布匹等发了财，购买土地成为富农。

这些地主、富农的土地出租给贫农，贫农向他们缴纳对半的地租。此外贫农也向中农租零散的土地。如上所说这个时期明东村的阶级分化已经明显的出现。

2. 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

清政府很歧视迁来延边的朝鲜族农民。最初是严禁迁入，如果私自迁来，发现了就要杀头，后因为迁来的人多不可能全杀了，清政府遂在延吉设立衙门（越垦局，光绪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改为撫垦局），进行了户口登记，以便于统治。但仍令朝鲜族农民回去，期限为一年，以后延长到十年，仍然无效。后来清政府为了防俄，采取移民实边政策，就默认了朝鲜族农民的迁入。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发布了“难发易服令”，强迫朝鲜族农民“入籍”。同时建立统治机构加强控制。于一八八三年在和龙峪（今大礮子）设立局卡和商务督理委员（当时明东村属和龙县）。在越垦局下设四大堡，堡下设社。社是由朝鲜“乡的”沿用而来。社长叫“风宪”，由农民选举产生，社的费用由社民共同负担。后来风宪由地方势力家担任，清政府委派。其职责是为政府催税、收税及应酬上级官府的来人来事、管理社民等。除了风宪还有一个书记。他们的薪俸是享受十垧地的收成和每年二百两叶钱（朝鲜币）的收入，全由农民负担。

后来军阀统治者也承袭了这套统治机构，仅仅名称上有些改变而已。在军阀统治下的人民是灾难深重的。当时明东一带与其他地方一样受尽横征暴敛。各项苛捐杂税极多，首先是田赋：一垧地要缴三——四元吉大洋，加上附加税达到五——六元吉大洋；其次是牛票：每张牛票要纳牛价的百分之五，但牛价是由统治者随便定的，并且往往一头牛不止开一张票，而要开五、六张，有的达到十一张之多。中秋节杀牛吃肉也要缴税，如果没有缴，发现地里埋有牛骨不是挨打就要罚款；第三是房牌钱：每年一次，大约要一元五角到二元吉大洋；第四是食盐专卖：政府控制食盐，强迫农民吃官盐，每一小斗官盐比私盐贵四——五倍，并且派稽私队来检查，如果发现有人吃私盐就要罚款，稽私队常常捏造农民吃私盐，从中敲诈勒索；第五是打地钱：土地三年丈量一次，每次丈量要收打地钱二两五钱叶钱。打地委员不去地里丈量，坐在家里随意增添面积数字，有一次打地委员将二千坪的土地，增加为一万坪，如果想要照实填写，必须请客贿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捐税，名目数不胜数。最严重的是巡警和稽私队来敲诈勒索，当时罚款的

事情很多，农民养鸡，官府硬說养鸡对××不利要罰款，农民娱乐硬說是賭博要罰款，小孩沒去上学也要罰款，甚至放一个屁如被他們听見，也以不礼貌而要罰款。如果查到有什么隱瞞稅收的人就要施以毒打和极刑，例如将发髻系在馬尾上，縱馬飞奔，或將手倒綁系于发髻上，手累时下垂則墜发，痛之入心。

明东农民也深受地主的經濟剝削与高利貸剝削，絕大多数貧农无地或地不够种，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交对半地租，并負責地主的割、拉、打、揚的无偿劳役。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向地主、富农借，受高利貸剝削。所謂救济农民的“义仓”，向农民放高利貸，夏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四升，向“义仓”借粮还需要通过屯长介紹或者用富戶的名义与保人互相担保才行。明东学校組織一个同窗会，每个毕业生交二元作为基金，以此放高利貸。因受高利貸剝削破产的人也不少。农民全永善談：他曾借了同窗会的錢，最后給他們地，才还清了債。

压在明东人民头上的不仅有反动軍閥和封建地主、富农这座封建大山，还有日本帝国主义。一九〇七年日帝在龙井設立“統監府派出所”。一九一九年“三·一三”反日运动以后，日帝加强侵略，領事館向大柵子派了三名警察，監視明东一带人民的行动。日本鬼子于一九二〇年到明东进行所謂“討伐”，鎮压反日武装，那年把明东中学也烧了。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延边地区建立两个經濟侵略机构：一个是东洋拓殖会社，专门放高利貸，人民借了它的錢，如果逾期不償还，就被沒收地照；另一个是金融組合，也放高利貸。受苦剝削的人很多，如农民朴泰俊借了一百元，买牛車，一年后要还一百二十五元，因为物价暴落，无力償还，把牛車卖了六十元，再卖了二垧地（作价六十元）才还上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上也加紧侵略，派間諜隐藏在明东学校，監視进步师生，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控制学校，把学校变成他們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

此外，还建立走狗机关“朝鮮人民会”，指派参議員来明东，監視村里群众行动，并向日本警察署报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人民的痛苦生活。

3. 明东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情况

被压榨的劳动人民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民就要起来反抗。明东朝鮮族人民反抗地主、富农、軍閥、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事例很多，其中有下列几个主要事件。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执政时，强迫朝鮮族人民“入籍”，并要每戶繳二元五角“入籍費”。对于这种剝削，明东人民坚决反对。他們联合外村农民一起到延吉道尹公署抗議，最后取得了胜利。“名义地主”金炳浩企图吞并农民合伙購買的土地，引起大家的憤怒，把金炳浩綁起来，准备把他烧死，以洩心头之恨。但因遭到官府阻扰未能成功。以后又同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反日运动。一九一九年延边朝鮮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明东学校是这个运动的策划机关之一，它成为反日运动的中心。一九一八年，延边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如姜凤羽、金奎燦等人去朝鮮参加朝鮮民族独立运动的秘密策划，他們到延边以后，朝鮮民族独立运动的消息很快的传布开来。当一九一九年朝鮮“三·一”运

动爆发后，在“三·一”运动的影响下，于三月十三日在龙井爆发了朝鲜族人民反日示威大游行。当天智新、德新两乡的群众，在明东学校运动场集合，结队前往龙井。参加这次斗争的有龙井周围八十里以内的七、八千群众，大家齐集在“龙井地名起源处”立碑的地方，然后到车站北边发电厂开会，会后在龙井市内游行，明东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示威的群众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发生了冲突，队伍走到汽车站时，军阀陆军团长孟富德下令士兵开枪（其中夹杂着日本便衣警察），结果死伤二十七名，当场死者十六名。其中有明东学校学生金炳荣（十六、七岁）、和平江五道沟小学教员朴宾浩等人，游行队伍被驱散了，但第二天又举行了十六名烈士追悼会。

“三·一三”反日运动以后延边各地出现了许多反日武装团体。明东是反日武装团体“国民会”活动的中心。因此，一九二〇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间岛大讨伐”时，明东学校被烧毁。

这些运动举起反日的大旗，在当时是进步的，但这个运动由于主要负责人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他们提不出明确的斗争纲领，民族主义思想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不能使广大的汉族与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参加斗争。使这个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九三一年春，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进行春荒斗争的时候，中英屯的群众在中共党员李永燦的领导下，和宁岩、花甸屯农民一起去大柵子，准备打开“义仓”分粮食给贫苦农民。但由于叛变分子廉敬俊的告密，敌人已事先布置武装，这次斗争遭到镇压，未能成功。此后李永燦在明东一带积极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民中间发展革命力量。不幸于一九三二年，在家里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牺牲，革命活动遭到暂时的挫折。

（二）日伪黑暗统治下明东人民的抗日活动

（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五年）

1. 日伪的黑暗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延边也进一步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当时明东属于和龙县，大柵子是村公所所在地。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政治控制，在村公所驻有伪警察，实际上由日本宪兵队操纵。村下设屯，每屯有屯长，屯里有参议员。这是日本的忠实走狗。日本帝国主义靠他们控制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对明东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曾几次来镇压明东人民的抗日活动，“扫荡”游击队，收买变节分子，豢养特务来破坏人民的抗日斗争，枪杀革命同志。日本帝国主义深怕朝鲜族、汉族人民的团结，处心积虑地挑拨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宣传日本是一等民族，朝鲜族是二等民族，汉族是三等民族等。

日本帝国主义加强经济掠夺。“九一八”以前的侵略机构“东拓”、金融组合仍然存在，而且扩大向外发放高利贷。“九一八”前农民主要是向地主、富农借贷，“九一八”以后主要是向东拓、金融组合借钱，从表面上看似乎利息比借私人的低，实际上加上手续费、抵押品、屯长的中间剥削、请客及先扣利息等，并不比借私人的轻。许多农民借了“东拓”金融组合的钱弄得破产，大龙屯农民金世焕借东拓五百元（日伪

币)，三年还不清，一万二千坪土地被沒收。有的农民土地被沒收还不够，家里的其他财产亦被拿走。这时东拓公开将掠夺来的土地出租，他們信不着农民，土地由东拓的二地主經營。租这种土地的农民要受双重剝削，既向“东拓”交地租，又向二地主交地租。

軍閥統治时期的各种高利貸机构仍然存在，这时又出現了勾結日本的一些新高利貸机构。如“合成組合”借金融組合的錢来放高利貸，借它的錢必須有二个保人，并以地照作抵押，逾期无力偿还，土地就被沒收。光明屯农民康元极，一九四二年借了“合成組合”的粮食，后来还不上債只得将自己的一千三百坪土地抵償。

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剝削也是极残酷的，除了对半分地租外，农民常常缺粮、缺生产工具。地主、富农借給农民粮食、耕牛、工具都收高額利息。明东屯农民徐秉极，一九三八年因为缺粮向富农借十七元，月利四分，后来还不上債，年年利滾利，到一九四二年增加到四十二元，最后只得給富农无偿的当一年长工才算还清。有的农民还不起債务只好远逃。农民向地富借用耕牛，除了将牛飼养好以外，到秋后还須交大豆八百五十斤，谷草一百捆。农民借地、富的碾子碾米，每碾一担（二百五十斤）納租三升，或碾一麻袋（一百八十斤）納租二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疯狂的榨取人民，除了高利貸盘剝外，更采用直接掠夺的办法。主要有：

①“出荷”：这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桩最沉重的負担。开始实行时“出荷”量还較輕，占农民粮食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左右。以后是越来越重，增加到占农民粮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据农民崔相權說，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日伪面临灭亡时更进一步疯狂的榨取，“出荷”粮几乎达农民粮食收入的全部。徐秉活那年打了七千斤粮食，一粒不剩都被搶了去。出荷粮是按田亩数交，不問土地的好坏与差别。而通常都是富人占沃地，穷人占薄地，所以吃亏的都是貧苦农民。而地、富往往請客賄賂，出荷粮免交，这部分就轉嫁到农民的身上。

②“奉仕”即当劳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軍事碉堡、筑路、修飞机场、采伐木材等等，摊派到誰誰就必须要去，貧苦农民是无法逃避的。

③各种苛捐杂稅：地基稅、土地稅、房屋稅、門牌稅、門檻稅、民会稅、牛稅、屠杀稅、死亡稅、出生稅、烟筒稅、国防献金……，名目不下二十种。大多数稅目貧苦农民都需要繳。农民还要供养地方統治者，每戶每年給社长納伪币一元，給屯长納八角。

④配給：日本帝国主义垄断經濟，控制生活日用品，实行配給制。

在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剝削、掠夺之下，朝鮮族人民过着极为悲慘的生活。許多农民剩下的粮食只够一家維持一个月的生活，整天喝粥是普遍的現象，遇到灾年更加遭殃。吃都顾不了，穿、住更談不上富足，許多人衣不遮体，冬天穿不上鞋。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明东学校，把它改为明东公立国民优級学校，取消一切传播反日思想的課程，强迫进行奴化教育。

2. 人民的抗日斗争

朝鮮族、汉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明东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經常自发地起来抵抗，埋“出荷粮”，逃稅

的现象普遍。比如中英屯的农民朴素俊应交的“出荷粮”是二千斤，但秋收时朴很快地把谷子埋在地里，只交出八百斤。不少人在“出荷”时把沙子掺在粮食里。

明东当时虽然是白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斗争仍有发展。一九三一年成立了农民协会，他们经常贴标语、散传单，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减租减息”等斗争口号。花田屯的全学奉（中共党员）就是当时的领导者。他的活动被敌人发觉后，才去五峰山参加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清算了一批走狗，明东附近也清算了十几个。一九三一年冬天，游击队的同志来到明东屯，召集群众开会，当时有三、四人执枪站岗，立即逮捕了叛徒吴乙烈。会上游击队要惩罚同窗会会长时，该会长保证以后不再放高利贷，并把借契、债据全拿出来当众烧掉才免于死。游击队向群众宣传了抗日的道理，劝大家不要借东拓的高利贷等。群众听了很受感动，特地煮了一顿饭，游击队员们盛情难推饱吃了一顿。

有一次十八、九个游击队员来到村里，召集全体群众宣传抗日，当场没收了惯做坏事和放高利贷的玄昌俊的地照和一个富农的两头牛。

有一天晚上，大龙屯来了许多游击队员进行宣传，农民玄昌治回忆时说：“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鬼子到此地之后怎样压迫和欺侮老百姓，讲的非常好，群众很受感动。最后，要群众给游击队以物质支援等”。

“九一八”事变后，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常来明东村宣传抗日斗争，有时住一、两天，他们都住在群众的家里，并且一起过中秋节。群众和游击队、地下工作同志的关系很密切，待他们如亲人，凡是住有地下工作同志连邻居都不让知道。据全永世老人谈，当时革命同志都是半夜来，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两种，地主富农怕他们，贫苦农民欢迎他们，保护他们。明东村也有叛徒和走狗，他们常常向日本人告密，有一次几个农民协会干部来明东住在农民家里，走狗李日男告密，朝鲜“民会”主事文致龙和自卫队的安基学来抓，他们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有三个同志牺牲。

由此可见，明东一带到处都有党领导的抗日事迹。

（三）解放以来几次政治运动情况

1. 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经过土改斗争，群众的觉悟普遍地提高，分清了敌我，认识到只有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农民的翻身、土改的胜利果实才会有保障。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明东人民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生产，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并且几次掀起参军支前的热潮，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青年更主动报名参军。方泰银老人动员两个儿子都参了军，一九四七年他儿子参军时老人嘱咐说：“祝你立大功，我在后方争取做个劳动模范”。儿子坚决地说：“我一定要立大功回来，希望父亲也一定要当上劳动模范和我见面”。父子双双鼓励。参军的青年都欢天喜地，戴上大红花，村里开欢送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全村共有三十一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占青年的半数以上。他们在军队里时刻记住父兄的嘱咐，英勇作战，三十一名青年中有三名立了大功，很多人立了小功。

根据战争的需要，明东村组织了五次担架队，有三十一副担架，参加六十余人。几乎每四户出一副担架。组织一次运输队，计六辆牛车和一輛汽车，并且经常给予物质支援。有一次全村每户平均捐了一双鞋，此外，有牙膏、牙刷、毛巾、手巾、烟包等。青年、妇女常常为战士们写慰问信，鼓励他们奋勇杀敌。

每年都开展拥军优属运动，每逢节日人们用劳动所得的收入或者每家节省下来的粮食，准备好各种饮食品送给当地驻军，表示慰问。与军队联欢，妇女帮助战士缝补、洗刷。由于参军而劳动力缺乏的军属，组织代耕，帮助他们种地、收割、打场，他们生活有困难都帮助解决，平时送柴火，节日送礼物等等。对军属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使他们的子弟安心在前方作战。发展生产保证粮食供应，是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实际的行动，大家都用前方战士杀敌的精神掀起互相竞赛的生产高潮。妇女、老人也不示弱，妇女为了让丈夫参军，代替丈夫参加生产，老人宋泰俊（五十岁）表示：“要以前线勇士们和敌人打仗的劲头在后方生产”。他积极帮助烈军属砍柴火、耕地、盖房子，在互助组里，常常鼓励大家多干活少休息，自己带头。由于他在各项运动中表现积极，一九四七年当选为区二等模范，而且三年保持劳动模范称号。积极发展生产，“前方要什么，我们就供给什么”，这就是明东人民支前的决心。

2.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朝鲜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共同为建设祖国，发展延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而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策动傀儡李承晚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并企图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略我们祖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暴行还记忆犹新。美帝国主义又妄想走日本老路，激起了明东人民的无比愤怒。明东朝鲜族人民，响应党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全村百分之百的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去前线作战，经过身体检查，有二十三名青年参军，有二名妇女志愿当了护士上前线，有七名青年当随军翻译，一名参加担架队。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有六十多名青壮年当民工参加国防建设。他们到前线后在各条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许多人立了战功，其中一个人立了大功。

一九五一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全村农民都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大家情绪激昂，人人多出一分力，多捐一分钱，多捐献飞机大炮打击美国狼。积极地砍柴火、卖黄菸、养猪，用副业收入来捐献。全村共捐四百三十五万元（旧人民币）。有的户捐四十万元（旧人民币）。另外妇女们还捐献了袜子、手巾、烟包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坏分子、富农分子曾兴风作浪，他们说：“哼！看吧！到底谁赢？”因此人民群众提高了警惕，对这些人加强了监督，防止其捣乱、破坏。

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群众的生产热情大大提高。一九五二年掀起了爱国增产运动，用多打粮食，多缴公粮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农民金福祿的妻子，动员丈夫参军后，积极参加生产，维持家庭五口人的生活，减少群众的帮助，被评为县烈军属代表与劳动模范。

3. 对建立朝鲜族自治州的反映和普选情况

延边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剧烈的革命斗争获得了解放，实现了政治上的

民族平等，改善了民族关系，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朝鲜族自己的共产主义干部。为了更加加强民族間的团结和祖国的統一，为了能够充分地发挥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正式成立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改为自治州）。自治区成立之前，进行了一个来月的准备工作，广泛的宣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意义。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对朝鲜族人民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他们深深的感激党和毛主席。金公世老人在一个月內积极参加各项大小会议从不缺席或迟到。有的老人因年迈不能参加会议，干部到他家里去宣传，一位老人感慨的说：“我多亏没有早死，不然就享受不到这样幸福的日子了”。一位农民说：“过去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呀！税官来了看见牛就起票，蓝衣服（指稽私队）见盐就要抓人；现在可真好啊！我们人民当家作主了，日子由自己来管，没有共产党我们都不知怎么样了？党给了我房子，给了我土地，如今又把国家政权交给了我们。”一位农民想起今天的生活和过去流血牺牲的烈士，流下了悼念的眼泪。自治区成立那天，开了庆祝会，大家都换上节日的新衣裳，尽情的欢乐和歌唱，许多年迈的老人愉快的跳起舞来，庆祝自治区的誕生。

自治区建立后，又掀起了发展生产的高潮。依照选举法的规定，从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九月明东开展了普选运动。七月县里派干部来帮助工作，确定选举步骤与組織村选举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广泛的宣传了普选的目的、意义和普选方法。全村群众划分成若干小组来学习讨论，进行户口登记，发动群众讨论选举权问题，对富农普遍进行复查。在充分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代表候选人，交给群众讨论。

普选结合生产进行，普选期间不仅没有影响生产，相反，由于群众提高了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更推动了当前生产任务的完成，出勤率比以前提高了。经过一个半月的宣传与候选人的酝酿准备，为了生产方便起见，全村划分三个选区，中英、花田屯为第一选区，明东、明化屯为第二选区，光明、大龙、东明屯为第三选区。在各选区分别投票选举人民代表。选举的那天，都以愉快而自豪的心情投票选自己所满意的人，光明屯六十五岁的一位老大娘在选举那天，穿上最好的衣服，在选举会场上一面唱歌一面跳舞，她唱自己顺口编的感激党的歌“共产党来啦，给我土地给我房子！好啊，共产党真正好，今天又给我选举权”。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选出村人民代表十七名，全都是朝鲜族（明东村没有汉族）；按阶级成分看，其中十六名是贫农，一名中农；按政治情况看，党员三名，团员五名；按性别看，男子十五名，妇女二名。并选出区人民代表三名，县人民代表一名。

在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十五名村干部，组成村人民政府。村政府除有正副村长外，还有民政、公安、财粮、生产、文教、卫生等委员。

通过普选，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随时向人民代表反映。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加强了为人民办事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普选中有的干部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决心在以后工作中改正。从而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同心合力为贯彻村人民代表太会的决议而努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4. 农村社会主义大辯論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月間明东村开展了历时一个月的农村社会主义大辯論。大体步骤是：首先宣传动员，然后群众鳴放，根据鳴放中提出的主要問題組織群众辯論，最后結合整社、整党和整团。

鳴放时，党支部派宣传員（党员）去各队，发动群众，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會議，掌握鳴放。經過宣传动员后群众都积极参加，白天生产，晚上开会。全村有七十人提了意見，占十八岁以上成人的絕大多数。鳴放出来的主要問題是：三定留粮問題、合作化問題、对党团行政干部的意見，并揭发了貪污粮食和坏分子販卖鴉片等問題。共計一百三十多件，其中粮食問題占总件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四。

根据鳴放情况，集中的辯論了粮食問題。有的人說：“三定政策我們不反对，只是留粮的标准太低，不够吃怎么办？”“粮食是否真的不够吃？”党支部抓住这些問題組織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辯論。鳴放辯論中群众揭发了貪污粮食的現象。中英屯二队几个干部，在一九五六年集体貪污粮食八千斤，大龙屯干部，集体貪污大麦二千八百斤。辯論前中英屯二队干部，只承認貪污六百斤。辯論中大家提高了覺悟，認識到粮食的重要性，对于貪污粮食的行为进行了尖銳的批判。犯錯誤的干部經過教育提高了認識，在會議上誠懇的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表示会后坚决改正。有的社員也主动的检查自己私卖粮食的錯誤，批評自私自利思想。通过辯論，大家認清了粮食問題的实質是思想問題。三定留粮标准不仅够吃，注意節約还可以有余。大家認識到三定政策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执行。与此同时，党支部針對鳴放中暴露出来的对合作化运动的一些模糊認識，加强了宣传教育，县、乡也派来干部大力宣传合作化运动的优越性与意义，澄清了認識。

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群众一面进行自我教育，同时紛紛揭发坏人坏事，坏分子金昌武、金有鉉販卖鴉片的不法行为，送交法院审讯，分別判处五年和三年徒刑。与鴉片販卖有关的金昌淵等四人也作了自我批判。

經過这次社会主义大辯論，群众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积极参加生产，呈現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春季积肥达六万六千車，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春耕春播比一九五七年提前十天完成。麦鋤时虽然抽出四十名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設，仍按期完成任务。秋收提前二十天开始，而且連中秋节也不肯休息，群众都自动地下地收割。此外，还抽出劳动力挖了二处地下水和一个平塘壩，积极参加城东水庫工程。經過上述一系列的增产措施，一九五八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

三、經 济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

1. 土地改革运动

（一）土地改革前的阶级关系

解放前，明东村的阶级矛盾是很尖銳的，虽然本村沒有大地主，但是教会、富农的

势力很大，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在一九四五年，全村共有一百五十五户，总人口八百二十人。其中富农八户，三十六口人，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五点一六，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三九。中农十五户，七十五口人，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六七，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一五。贫农一百二十九户，六百九十六口人，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二七，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八九。雇农三户，十三口人，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一点九三，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八。

全村共有耕地三百六十垧(以大垧计算一垧等于三千坪)，外村(长财村)地主占有五垧。占人口百分之五点一六的富农占有耕地一百五十垧，占全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一·六七。占人口百分之九点六七的中农有一百垧，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七八。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点二七的贫农有六十五垧，只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八点零六，学校有二十垧(实际是校长——日伪汉奸的)，占总面积百分之五·五五五。教会有二十垧，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五五五。地主、富农、教会、学校共占耕地一百九十五垧，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一六。富农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四点一六垧，而贫农平均每人只占零点零九垧。占人口百分之一点九三，雇农连一亩耕地也没有。可见解放前地主、富农、教会、日伪汉奸和农民贫富相差的悬殊。

解放前夕各阶级占有耕地比例表

富 农		教 会		学 校		中 农		贫 农	
耕地数	占%	耕地数	占%	耕地数	占%	耕地数	占%	耕地数	占%
150	41.67	20	5.555	20	5.555	100	27.78	65	18.06

注：外村(长财村)地主占有耕地未列在表内。

富农也占有大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据一九四五年统计，全村有牛六十头。其中富农十四头，占总牛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三；中农十五头，占总牛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贫农有三十一头，占总牛数的百分之五十一·六六。全村牛车共有六十辆，其中能用的四十五辆。富农占八辆，每户平均一辆。中农占十五辆，每户平均一辆。贫农占二十二辆，每户平均零点一七辆。全村共有五十个步犁。富农八个，每户平均一个。中农十五个，每户平均一个。贫农三十个，每户平均零点二三个。

由上可见，占全村人口极少数的富农却占有大量土地、财产。占有全村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点八九的贫农却只占极少数的贫瘠的土地。地主、富农、教会把占有的大部分土地出租，对贫苦的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